

# 胡风文艺思想之现代性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探析

◎ 李红慧 程思义

**【摘要】** 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史整体观的确立及现代思想文化学术资源研究的深入,胡风文艺思想烛照出丰富的现代性内质。本文旨在通过对文学史的背景梳理,还原胡风文艺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特定的问题情境和精神诉求,描述出胡风对五四启蒙主义战斗传统的坚执与捍卫、深切的认同与现代自觉。

**【关键词】** 胡风;文艺思想;现代性;五四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5-0043-5

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不论是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还是从他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来看,都直接指涉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主要问题。胡风作为参与建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人物,在一个公共话语全面抢夺话语权的独特历史时段,坚持五四个人话语立场,坚执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精英意识,这其中个体的人格精神与历史的错位,书写成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沉重与悲凉的一页。

由于历史具有事实和文本的双重形式,因此当人们理解历史时,已经参与了历史,历史并不仅仅是对象。伽达默尔提醒我们,一种真正的历史

思维方式应当“牢记它自己的历史性”<sup>[1]</sup>。那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又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呢?胡风对“五四革命文艺传统”(胡风语)的想象与重构是基于一种怎样的“现实文化关系”和文化视野呢?这种重构与对话是如何内在地改写、校正与制约其文化立场与文学思想?作为“传统”的五四文学又是怎样叙述着胡风文艺思想的?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 一、五四反传统主义

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文化颠覆力量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是由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而使这些千差万别的学说、个性各异的

〔作者简介〕李红慧,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程思义,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45。

人们组成一个新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的,据汪晖的研究,乃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或通常所说的“五四反传统主义”。五四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对于对象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持续地存在于五四以及其后的中国历史之中。而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倾向,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对象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整体主义的批判和怀疑。<sup>[2]</sup>

把人从种种抽象实体或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的觉醒”、“人的发现”构成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真正本质。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主观教条主义和客观公式主义统治了左翼文坛。胡风认为这两种倾向照搬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从而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和思想规范,既消解了创作主体的人格力量和主体性,又抹杀了创作客体的人作为“感性的对象”的无限丰富性,把人单纯作为“阶级”或“绝对理念”的工具。胡风提出“活人论”,认为只有在作为客观的“感性的对象”和主观的“感性的活动”有机统一时,人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活的“活人”。

上世纪3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sup>[3]</sup>救亡的喧哗与骚动淹没了启蒙的微弱声音,五四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或被新意识形态重新改写。胡风不合时宜地反复强调“革命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任务的内在一致性,“使五四新文艺的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把反封建提到了和反帝同等的地位(《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下引该书不再注出处)。民族的解放与民族的进步在其视域内是双向同构的,因此,他评价鲁迅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叫做‘进步’的目标”。他评价五四“从被当做千人一律的劳动机械的人民里面发现他们原来是各有个性的生命,即所谓人的发现,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件大事”。

1940年前后,当“大众化”、“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出现了因民粹主义心理和政治功利需要产

生的对“人民”“大众”的偶像化崇拜倾向时,胡风提出了与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主题一脉相承的“精神奴役创伤论”。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将“民间形式”归于“封建主义”而大加鞭挞。胡风呼唤以“主观战斗精神”冲决传统奴性意识;强调“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对“亚细亚的落后”、“亚细亚的封建残余”保持警醒。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五四“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更强调了五四的世界性、异质性和反传统性。

胡风对五四传统独立特行的坚执终于在1948年触发了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为阵地的左翼文化人对“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的批判。在为回应批判而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里,胡风明确地将问题归结为“对于国际文艺传统(高尔基的道路)和中国革命文艺传统(鲁迅的道路)的坚持和号召”。他把五四启蒙的文艺传统概括为“以意识斗争为先锋的社会斗争,那基本的内容就是使人民底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

中国的现代及其启蒙主义是一个“远未完成的方案”,胡风从对中国现代性面临封建传统的巨大阻力的估计出发,违逆众声反复强调五四传统的现实文化(学)意义,体现出一种弥足珍贵的现代自觉和警醒。

## 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现实主义精神传统

在康德眼里,启蒙是获得了勇气的个人运用知性反思走出传统束缚及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过程。然而,由于20世纪现代中国深广忧愤的历史情境和现代性焦虑,五四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对理性能力的自我确认及强烈的改造、变革现实的使命感,是一种无需在知识论域加以论证和限制而自明的道德实用主义的自我期许。

这就造成了五四的启蒙概念由注重自我现代人格的自主和自决,移向“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立人”等与民粹主义发生广泛价值关联的特殊内涵。

在胡风那里,五四启蒙运动就是“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中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他将“20多年来的这一点启蒙运动”造就的“我们遭受的文化传统”命名为“先锋文化”,以这种“文化传统”为指导的文化活动“在最大多数的场合”都“是以现代的思维方法作基础,而且是要把对象向现代的思维方法推进的”。这种“先锋文化”倡导由主体去改造对象,提高对象,以主体的意识为意识,将对象上升到主体所具有的层面即获得“现代思维方法”,从而主客体“相拥相突”,共同得到促进和发展。胡风强调知识分子身份的创作主体,以“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和“自我扩张”突进现实生活,以医治大众“精神奴役的创伤”。在其视域内,知识分子表征着“先锋文化”,“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在一个要求知识分子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并逐渐失去独立声音的年代,胡风恪守五四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和岗位意识,建构起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精神谱系。

胡风对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吸纳和理解,形成对以“写真实”为核心范畴的现实主义的追求与推崇。他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反映论和认识论,强调了对于客观现实的镜式摹写功能,却忽视了创作必须经过作家的中介,忽视了作家主观精神的参与。

胡风的“写真实”首先是一种张扬主体性的“写真实”。“真实性”始终是生命的流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其二,他讲的“真实性”是存在于审美感性之中的“真实性”。他说:“人创造了感性的世界,这感性世界又是活在人底‘活的感性的全活动’里面的”,从而使现实主义真实性理论突破了生活的现象真实的局限,而突进到艺术活动的本体世界;其三,胡风的“真实性”又是一种

感性和理性相融合的真实,它存在于感性和理性的化合之中。感性是以理性为内容的感性,理性也是以感性为特征的理性。其四,胡风的“写真实”是以“人”为中心的“写真实”。真实性存在于对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人的历史过程的审美把握之中。<sup>[4]</sup>

由此可见,胡风的“写真实”以人道主义思潮为哲学背景,与五四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有深刻关联。在此视域内,他批判主观公式主义“不能透过政治现象去把握历史内容”。通过对于历史内容的把握去理解政治现象,只是对于政治现象无力地演绎。沦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拉萨尔“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客观主义则丧失了主体的内在激情和主观能动性,使“他和他的人物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从而“使现实虚伪化了,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二者都远离了艺术的真实要求和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精神传统,“本质上却是反现实主义的”。

胡风对于创作主观的强调,也反映在他把对象不仅看作是一个客观的物的世界,更看作是一个主观的人的世界,“对象是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他尊重作为创作对象的人的主体地位,不是把他作为一个僵死的“客观”,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具有生命意义的“主观”,因此,他重视作为创作对象的人的内在生命,因此心理描写在胡风那里具有特殊的意义。胡风强调作家的心理描写的意义,要求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批评作家在表现人物关系时成为了“图解式的东西”,忽略了人物的复杂性,“他的心理或意识不会是一目了然地那么单纯”。为了准确地把握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他要求作家对于人物的主观参与和实感体验,向人物精神世界深处开掘。他说:“真正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的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时候才能达到。所谓交涉,就是主体发挥自己的全部的心理功能,对创作客体进行体验、渗透、选择,形成互相交融的类似化学的化合



反应。”而“如果是心理状态最复杂或精神斗争最激烈的对象，那就一定要从他的复杂性或激烈性去把握他，反映他”。胡风的文艺理想与理论基本上都可看作是对动态的、非序列的创作心理过程的揭示，我们将之命名为“心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而这种现实主义显然是对关注人物文化心理现实的“为人生”的五四启蒙写实主义的承续和延展。

### 三、胡风对鲁迅的阐释

1933年，瞿秋白发表了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把鲁迅的思想归纳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蜕变，胡风对此提出了异议。胡风认为，“进化论也罢，阶级论也罢，这都不是鲁迅本人所创造的‘思想体系’”，“更不能机械地分为前期后期”。胡风认为，鲁迅之为鲁迅，在于把这些外来的“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现代性是在民族救亡危机的催逼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中展开它的叙述进程的，胡风认识到这一进程中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的痛切期待和热切的文化想象。胡风看到了承受着东方落后重负开始进行现代启蒙的“思想斗争”的中国，启蒙者目不转睛地盯住跑在前面的西方，追着、赶着，难以摆脱生吞活剥西方概念词语的“思想锦标”式的惯性约束，“只是急于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渐渐飞离脚下土地，无法通过灵魂的挣扎，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生存体验探索民族和个人的可能出路。胡风的这一说法自然是和鲁迅吻合的，鲁迅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文艺界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sup>[5]</sup>

胡风以概念教条/实感体验的二元对立凸现鲁迅作为思想家的不可替代的存在。他说：“思想运动里面不知道有过多少的悲喜剧，有些人根本不懂中国社会，只是把风车当巨人地大闹一阵，结果是自己和幻影一同消亡；有些人想深入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但过不一会就投入了旧社会怀

抱，所谓‘取木乃伊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究其原因，“那些思想运动者只是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而鲁迅却把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从而他的文体“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胡风说：“只有当思想成了自己的生命机能才能算是思想的鲁迅。”

胡风的分析无疑十分到位和传神。早在写《破恶声论》时，鲁迅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观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sup>[6]</sup>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风，都强调以自己的“实感”，把外来思想融入到自我个体生命内部，使之从外在的东西变成感同身受的切己内容。这要求生命具有担当心灵重压的能力。而没有立足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没有从个人最深处出发，就只能是为思想而思想。胡风把鲁迅开创的传统命名为“即于现实也针对现实”的战斗传统，强调思想必须从现实惨淡人生中生成，思想本身是融入了人生体验的生命的一部分。

从这个视角切入，在胡风视域内，存在者的鲁迅就取代了思想家的鲁迅。胡风敏锐察觉出鲁迅作为文化传统的叛逆者、审视者和批评者所注定的悲剧性的存在，“何曾经验过他所经验的那么沉重的悲痛呢？”“难道这一切不是经过鲁迅自己的痛苦体验而想象出来的？”在胡风看来，这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人格精神与整个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悖逆性。胡风忍不住向自己提问：“如果现在他还活着，他会怎么做？”他没法不给出一个令人绝望的回答：“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胡风多次提到鲁迅那句自我心灵的表白：

“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自觉以一个精神同道者的身份去体验，分担鲁迅所承受的炼狱般的浩瀚无边的心灵苦难。

胡风把鲁迅思想/文学的本质表述为“心与力的完美结合”。他说：“别人当战斗的时候是只能运用脑子，即所谓理智，或者只能凭一腔热血，但他则不然，就是在冷酷分析里面，也燃烧着爱憎的火焰。”胡风由此切入鲁迅的创作，“翻开他

的作品,不是充溢着爱心就是喷射着怒火。”并把这种发源于生命内部的激情总结为:“这是一个伟大战士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基本条件。”胡风强调鲁迅罕见的意志力量、情感、自由意志、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和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塑造出一个“红色”鲁迅。<sup>[7]</sup>而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批判者,只身投入到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灵最深处,具有独立精神品格和思想复杂性的鲁迅却被消解和遮蔽。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胡风违逆众声地强调鲁迅“无时无刻不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进步’的目标。在他,没有为进步的努力,解放是不能够达到的。”胡风把鲁迅开拓的五四“为人生”的启蒙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命名为鲁迅传统。胡风说:“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就是在1955年即将身陷囹圄写作“三十万言”时,胡风仍把鲁迅看作一个人道主

义者而不是阶级论者,阿Q在他心目中仍是反映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

胡风认为,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话语和国民性的批判,是一种远未完成的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史,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这在文化领域,又是依照西方以建构取消差异的现代意识形态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历史。不论是鲁迅还是胡风,把在别人那里呈现为赤裸裸的概念形态的思想理论问题,转换为活生生直剖明示的问题——心灵体验、心灵判断、心灵取舍的问题,自觉用属己的心灵体验去测量。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对鲁迅的记忆和阐释,呈现的是一个浓缩了深刻人生体验、饱含着思想求索的痛苦的“实感”的鲁迅。

由此胡风开启了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坚执、捍卫。胡风从鲁迅那里发现了当代生活与鲁迅无法断裂的精神联系,从而自觉地把自我置入到这一精神传统的联系中去。一句话,胡风对精神“态度”、人生“实感”的强调,是通过对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升华为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生命意识相结合的理论体系的。

#### 【参考文献】

- [1] (德)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集[M].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48
- [2] 汪晖. 汪晖自选集之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307-313.
- [3]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 中国现代化史[M].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7.
- [4] 周勃、达流. 胡风与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主义[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5] [6] 鲁迅. 鲁迅全集[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87, 28.
- [7] 转引自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极其文学世界[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401-410.

(责任编辑 王 林)